

#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

韩喜平,马晨铃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努力的方向。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深入探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应该重点从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理论内容和架构范式四个方面入手,着力打造标识性概念,推进经济学研究方法融合创新,吸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精髓,构建系统化的自主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政治经济学;标识性概念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2023)08-0001-06

**DOI:**10.16011/j.cnki.jjw.2023.08.00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与发展趋势的特殊功能,承担指引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任务,所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学便尤为重要和迫切。中国共产党建党百余年以来,高度重视经济建设,不断探索经济发展规律,总结经济建设经验教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学人的使命和职责。对于这一问题,理论界也展开了热烈的探讨。研究认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应该从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理论内容、架构范式等方面入手,具体地说,就是着力打造标识性概念,推进经济学研究方法融合创新,吸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精髓,构建系统化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 一、着力打造标识性概念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质是与存在同一的直接的规定性,……,某物之所以是某物,乃由于其质,如失掉其质,便会停止其为某物。”<sup>[1]</sup>“概念”是

知识体系的具有一般性的原子类范畴,“标识性概念”则是赋予一般性概念以时代性、民族性的特殊内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对经济学知识体系进行“质”的规定。标识性概念是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框架建构、对外传播表达、逻辑疏通完整的核心元素。一种理论一般是有着标识性概念的,不同经济学派的标识性概念是其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核心要素。马歇尔的一般均衡理论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凯恩斯宏观调控理论,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世人所熟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则以“国家、产权、意识形态”理论为标识性概念,构建了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同样也是以标识性概念的革新为基础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继承中创立的,他承认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财富增长、专业分工、价值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马克思认为经济学内部的范畴和规定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这些范畴实际上反映了在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不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人民至上经验研究”(22ZDA009);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2022CXTD08)

**作者简介:** 韩喜平,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晨铃,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经济社会进行考察, 所以其对于价值的讨论本质上属于“交换价值”的范畴, 经济学内部范畴缺乏完整性, 进而导致了其知识体系的不科学性。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标识性概念范畴, 马克思从商品这一经济社会的最小单元入手, 将经济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因素抽象为不同的具体范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阐明了商品生产中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 一种是可以被抽象的, 在质上相同、在量上可以进行比较的抽象劳动; 另一种是不可以被抽象的, 在质上不相同的劳动, 其指出: “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 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和特殊的劳动”<sup>[2]</sup>。基于此, 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价值形式的理论, 通过对社会历史的考察, 从原始的物物交换出发, 阐明了货币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和货币本身的本质规定性。他指出: “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规定, 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 交换价值取得一个和产品相分离即相脱离的存在。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 就是货币。”<sup>[3]</sup>所以价值形式是指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 货币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结果。正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标识性概念出发, 马克思才完善了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价格、货币等重要范畴, 破解了李嘉图理论的“两大困难”, 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创立奠定了基础。

新时代, 要在经济学理论中提炼总结中国经济学, 只有打造标识性概念, 才能解决我们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失语”状态。长期以来, 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一直掌握着理论界的主要话语权, 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产权、计量等标识性概念几乎已经成了“经济学通识”。诚然,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进程处于领先地位, 为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最“先进”的研究对象, 所以相较于其他经济学知识体系, 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也导致了我们在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现象、总结经济建设经验的过程中, 频繁使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模型、话语。但是, 一方面, 当前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已面临来自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 理论方面因缺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本质分析而后继乏力, 现实发展更与其构想的美好场景背道而驰, 其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已经与现实状况相差甚远, 逐渐落后于时

代发展; 另一方面, 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中概念体系的确立框定了其自身的理论边界、限定了其解释经济现象能力的上限, 因而不能够完整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逻辑。更重要的是, 西方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还隐含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 是资本逻辑在理论层面的产物。如果依赖使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体系、研究范式, 则必然会落入“资本至上”的发展路径当中。所以只有跳出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逻辑圈层, 突破原有的学术框架和理论范式, 打造基于中国发展实际、体现中国经济特色的标识性概念, 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才能更好地总结经济发展经验、指导未来经济建设。

新时代打造标识性概念, 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之下, 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证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概念、范畴、经验, 并进行系统化和学理化的升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必须基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核心标识性概念范畴的把握, 以历史具体的眼光看待资本、分配、消费等一系列重要范畴, 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革命性、人民性。同时, 从我国发展实践中吸取建设经验, 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概念体系以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 以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方向为根本依据, 立足于大历史观, 从纵向维度把握同过去相比当下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内容; 基于国际视角, 从横向维度把握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中国特色。进入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平衡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实施“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 脱贫攻坚,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高质量发展,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等等。打造标识性概念, 必须深入研究这些新概念、新经验、新范畴, 将“异常性”积累起来以促进新的范式生成, 并赋予它们更为丰富的经济内涵和操作性定义。并进一步将这些概念范畴放大到经济学理论框架当中, 加强对它们的学理化研究和学术化阐释, 基于标识性概念完成研究框架范式的革新, 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 二、推进经济学研究方法融合创新

一个知识体系之所以能够完成对前人的超越, 不仅是因为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工具, 更重要

的是它更能接近事物发展的真相。而对同一经济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的不同可能导致结果的天差地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以标识性概念作为基础,更需要吸取现代一切有益的研究方法,通过有机融合推进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完善了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概念体系,更揭示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误区,在广泛吸纳当时最先进的多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作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曾在和恩格斯通信时说:“《资本论》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sup>[4]</sup>相比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单纯地将具体事物抽象为概念的单向过程,马克思一方面承认这种方法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认为若想真正洞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还必须从抽象再次上升到具体。他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sup>[5]</sup>进而马克思通过把政治经济学中的抽象概念具体展开,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概念范畴的系统性集合,他将其概括为“抽象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sup>[125]</sup>,并认为这是更具有科学性和正确性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从经济学内部中找到了各种要素的内在联系,使经济学具有了独立学科形态,但由于缺少科学辩证法的指导,他们只是在“一个混沌的关于表象的整体”的感性理解中找到了表层规律,并不能从“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理性具体中挖掘内在规律,导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整体性上具有形而上学的缺陷。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起点,将经济社会中的个体抽象为单质般的存在,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借助唯物辩证法,将政治经济学从研究经济表象层面“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深入到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层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乃至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唯物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指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sup>[6]</sup>，“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sup>[7]</sup>。所以,中国自主的政治

经济学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必须要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所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还要吸收时代前沿的其他研究方法,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放性、包容性的理论特质,更是应对经济飞速发展、变量增多的必然要求。数学能够更为直观和精确地表达一些思想观点,同时也为学术的交流和探讨提供了统一规范,所以对数理方法的使用是必然趋势。马克思也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sup>[8]</sup>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使用数理工具尝试定量研究,然而迫于时代的局限,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还不够完善。随着高等数学、心理学等众多自然学科逐渐成熟,西方经济学掀起了边际主义革命,开创了经济学微观分析的新局面。西方经济学家将大量非经济因素引入经济学知识体系,建立了伦敦学派、洛桑学派、奥地利学派等众多经济学流派。应该承认的是,引入数理模型、心理分析等工具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研究方法。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对这些方法工具的狂热,实际上使经济学超脱了客观的社会现实。从历史的角度看,基于从数理模型中得出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可以实现社会财富的观点,整个社会生产愈发接近无政府状态,并最终造成了“大萧条”的出现。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往往缺少科学的理论前提。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数理模型当中,都缺少了对数量关系的前提进行科学的抽象和分析。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在引入数理工具后几乎不再区分两个经济变量的依存关系是在价值意义、价格意义还是在使用价值意义上存在,反而以数理工具掩盖了隐含在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说明,我们要将现代分析工具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必须有需要注意的前提。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推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范式的创新,需摒弃学科之间、方法之间的“门户之见”,处理好唯物辩证法和数理工具、心理分析等众多现代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完成对现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借鉴西方经济学

有益成果的研究方法,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卓越成果,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经验,逐步形成区别于原有范式的方法革新,为我们继续推进中国自主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和范式的创新提供“范本”和基础。我们要继续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顶层设计”和根本遵循,要借鉴、吸纳、融合一切有益的现代科学方法,使其为唯物辩证法服务,为唯物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发展提供支撑和补充。我们要抓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标识性范畴和逻辑主线,利用唯物辩证法从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中抽象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理论范畴,完成各个理论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本质规定。例如,“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sup>[9]</sup>。在确定整体研究的基本方向后,再通过现代分析工具进行范畴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微观分析,在直观呈现分析结果的同时,给予更多的操作性建议。

### 三、吸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精髓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体现民族性、继承性<sup>[10]</sup>。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的重要内容,需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11]</sup>。要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借鉴参考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更要吸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精髓,并对其进行创造性发展,进而丰富和充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并赋予其中华民族的鲜明特征。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含有丰富的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性和指导性作用的理论内容,比如“民本”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古代统治者最初为了追求政权稳定而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强调体恤民心、与民更始。随时代变化,“民本”逐渐演变为一种发展理念,孟子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将民心作为政权的合法性依据,将农业生产视为国家根本,倡导与民更始,重视民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体现了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再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管制思想体现了对市场和社会秩序的保护,节制思想

体现了对资源节约的重视,均贫富则体现了对共同富裕分配理念的加强,中华传统经济思想能够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资源。

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认为社会效益就是个人效益的加总,进而通过追求个人效益的最大化来实现社会总体效益的增长,进而抹杀掉了经济个体的差异性,同化了个体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社会总体福利也因此变成了一场零和博弈。加里·贝克尔更是认为,人类的“利他”行为只是基于“经济人”假设使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无论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认为每个人都是现实的个体,同他人存在着异质性,所以应该追求“求同存异”“天下大同”的更高境界。而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不断前进,生产和消费层次不断提升,经济个体在行为选择中的“受迫性”选择会越来越少,“主体性”选择会越来越多,上至我国经济宏观决策的制定,下到个体经济微观行为的决策,来自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给予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够解决绝对贫困的历史性难题、良好应对每一次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经济困境、坚定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当然,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融入经济学知识体系,绝非单纯为了给其贴上民族的“标签”而与众不同,而是因为这样能够更加准确地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发展实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中华传统经济思想中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正是我们社会意识的重要来源,其对于政府部门的政策、经济个体的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传统经济思想也给予社会个体内在的文化、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引导,已经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功能。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由于中国人民在劳动中所体现的吃苦耐劳、勇于奉献、乐于助人等精神品格在经济建设的现实中转变为了巨大的现实力量,如果我们不能将中华传统经济思想纳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中,就失去了来自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给予我们的内在精神激励,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重要助力。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要充分吸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理论内容,继续深入挖掘其中民本、管制、节约等内容的理论内涵,剖析其对

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和现实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发展。同时,要重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将其纳入解释经济现象、引导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熊彼特曾指出:“那些在分析上无法控制的思想,在分析工作开始的整体经济过程和普遍的概念领域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sup>[12]</sup>虽然这些因素以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形式存在,在量化分析上存在难点,但是只有充分考虑这些非量化因素的作用,才能使中国自主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更切合中国发展实际、更符合中国国情。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代表的非量化因素既是各经济因素组合过程中的“润滑油”,同时更是使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催化剂”。我们要充分利用好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给予人们的内在精神激励,将其融入现代经济学话语体系,完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结合,构建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 四、构建系统化的自主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

所谓体系必然是系统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系统的、完整的。在理论界具备影响力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都具备系统化的重要特征。比如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就经历了从碎片化向系统化的转变。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就是碎片化的经济政策主张逐渐转变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的过程。重商主义代表托马斯·孟主张发展海外贸易,通过制造贸易顺差以赚取金银财富;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引入了“自然法”“自然权利”等概念,初步确定了私有财产这一重要范畴,确立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达德利·诺思在《贸易论》中反映了17世纪下半期英国自由贸易越来越强烈的倾向,在理论层面呈现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雏形。弗朗斯瓦·魁奈根据法国的具体国情创立了重农学派,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和对土地所有者单一课税。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思想观念等理论内容,都是依据本国国情或自身阶级所处的地位,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阐述的具有“特殊性”的经济理论。所以无论是在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方面,还是在其理论对外传播的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直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经济学客观规律,并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了包

括价值理论、生产理论、分工理论、分配理论、贸易理论等一系列具有“一般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学理性的角度证明了只有放任才能财富最大化,才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依旧是为资产阶级牟利的理论工具,但必须承认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因其系统性和学理性,在理论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英国古典政治学吸收创立的过程更能直观说明系统性、学理性对知识体系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起初以人本主义的哲学视角解构资本主义社会,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进行了批判。然而以工人阶级的“价值立场”为依据的批判同样是一种富有“特殊性”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架构。直到马克思建立了唯物史观,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立场上利用唯物辩证法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抽象为经济学内部的概念内涵,才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研究。从商品出发,马克思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渐完成了包括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再生产理论、个人所有制理论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在揭示了人类社会“一般性”规律的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真面目。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架构和学理性阐释也成了其理论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经济生活本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马克思指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不同的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sup>[13]</sup>经济发展中不同变量相互影响,各个环节紧密相扣,经济个体各自选择,多种因素相互结合造就了一个复杂但有序的经济系统。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调动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现实经济生活的理论反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只有做到进一步系统化,才能实现理论对现实的全面反映,才可以用理论推演并正确引导实践发展。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务必要注重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与专业性<sup>[10][22]</sup>。目前我国经济学研究依然存在知识碎片化、分散化

的问题。脱离系统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单独分析其中的某一经济理论,容易造成片面的理解和认识的失误。所以首先必须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发展中的实践经验,将基于我国发展实际的“特殊性”经验上升为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学理论。要将经验中的因素、概念、理念、机制等抽象上升为经济学概念,以标识性概念为基础给予它们逻辑的疏通和富有学理性的阐释。如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观点,本质上是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探讨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再如新发展阶段,本质上是对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创新;新发展理念,本质上是对经济发展原则的规定;新发展格局,本质上则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新发展,等等。当今解决问题的方法越来越综合、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要推进学科交叉发展,就要将社会学、环境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内容有机融入中国自主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当中,充分吸收多个学科中能够促进经济长远良性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相关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才能助力构建系统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 [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428.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  
[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0.  
[6]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11-25(01).  
[7]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人民日报,2015-01-25(01).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回忆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7.  
[9]洪银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创新[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3):4-14.  
[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  
[11]杨瑞龙.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N].人民日报,2022-08-15(09).  
[12]埃斯本·安德森.约瑟夫·熊彼特[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255.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2.

##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Strategy for Building China'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HAN Xi-ping, MA Chen-qian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201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s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new era. How to construc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has aroused many scholars' in-depth discussion. To construc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e should focus on four aspects: conceptual system, research method, theoretical content and framework paradigm, and strive to create a symbolic concept,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economic research methods, absorb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and build a systematic independent political economy knowledge system.

**Key word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political economy; symbolic concepts

(责任编辑:李春梅)